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学俭工勤法赴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赴法勤工俭学  
周汉萍 余波 编著

70 多年前的一个春日，大厦林立的黄浦江边，一艘艘巨轮不时拉响汽笛。上午 11 时，日本邮船因幡九号又一次开始了赴欧的航程。旅客中，有 89 名年轻的中国学生，神情激动而又不安。他们是首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有志青年。在法国——共和主义的故乡，他们将当工人、勤工俭学，以掌握使中国获得独立、富强的技术和知识，回国后，他们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时年 1919 年 3 月 17 日。

首批学生经过 55 天的航行，于 5 月 10 日到达法国马赛港。此后数月都有百余名学生离开上海前往法国。到 1920 年末，约有 1600 名中国学生，在法国过着边学习边劳动的“勤工俭学”生活，形成了一支颇为壮观的留法勤工俭学队伍。周恩来、邓小平、刘伯坚、赵世炎、李维汉、傅钟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跻身其中，并成为中坚和先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不仅意味着历来轻视体力劳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后代靠自己作工去挣得学费，而且说明了他们在积极地赞美劳动的神圣，学习外国，努力把知识和劳动结合起来，在血和汗的奋斗中，寻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

赴法勤工俭学是五四运动的产物。留法勤工俭学史是五四运动史不可分割的一个构成部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国内的革命斗争一起，构成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一、先声

1912 年 2 月，伴随着辛亥革命成功的礼炮声，留法俭学会在巴黎成立。发起人是蔡元培、李煜瀛、吴敬恒、张继、张人杰、褚民谊等。

蔡元培是个理想主义的教育家，曾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先生的最终理想，在于运用世界观和美感教育，实现超越政治的教育目的。所谓世界观教育，就是超越现象认识实体世界的存在，所谓美感教育就是实现实体教育的手段。教育的目的就是这两个方面。而对贫穷软弱的中国来说，就是富国强兵。蔡元培为此提出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为当时的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是指对外抗拒欧美列强的侵略，对内抑制军人的专横。实利主义教育是为了增强财力，巩固军事。为了避免以上两个方面教育中可能出现的弊端和危害，还必须加强第三种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什么是公民道德呢？蔡元培将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大口号，分别用中国的“义”、“恕”、“仁”来解释。富国强兵的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完全是法国式的道德。再加上他的公民道德主张，完全是以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教育为楷模的教育理论。遗憾的是，由于袁世凯叛变革命，仅仅任职 7 个月的蔡元培便辞职了。他的教育理想几乎没有付诸实现。

李煜瀛、吴敬恒等人在巴黎是无政府主义者，办有杂志《新世纪》，并在经营工厂、商店的同时，创办“中华印字局”，印刷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另外，李煜瀛还开设“豆腐公司”，生产豆腐、腐乳等豆制品。工厂的工人都是他从河北故乡招募的。劳动之余，李煜瀛不仅教他们学习法语，还进行为人处世方面的教育。武昌起义后，李煜瀛回到国内。

当时的无政府主义主张：“社会中个人为本位。合诸个人而为村。合诸村而为国（非国家乃地方也）。会诸国而为社会。”因此，要改良社会首先要改进个人，完善个人的道德。旧中国腐败的原因就在于道德沦丧，树立新

道德是当务之急。因为，辛亥革命已经带来了政治上的成功，以后任务就是努力造就适合于新社会的具有新道德的人。

1912年2月，汪兆铭、李煜瀛、吴敬恒等人发起成立“进德会”，其宗旨是：“适应天下潮流、联络天下有志之士”，共同进行道德研究。进德会将反对卖淫、赌博、纳妾作为基本义务，还有其他更为严格的纪律。进德会是一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新生的共和国造就一个正统社会的道德改良运动。

李煜瀛等人对留法华工的教育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效，在法国培养人材的设想便提了出来。

1912年5月，留法俭学会正式开展活动。首先，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顺天高等学堂旧址，开办了预备学校。学校由巴黎豆腐公司经理、戏剧研究家齐如山主持。首期20多名学生，其中2名是女生。这些学生全部寄宿，自己承担伙食、卫生等工作，用刀叉吃西餐，学习法语、数学、国语等等。课程为4个月。1912年8月，10多名来自四川的同学成为第二期学员。

11月，第一、二期40多人乘火车经西伯利亚赴巴黎。12月20日，他们到达巴黎南面约600公里的蒙达尔。他们有的进了蒙达尔中学的预备学校，有的进了工业职业学校的预备学校。此后几年，为躲避战火，他们疏散到法国的其他地区。很多人进了大学，获得了学位。

在国内，留学俭学会继续招生。1913年6月，又将40余人送往巴黎。李煜瀛、齐如山看到工作进展顺利，不禁夸下海口：5年之内将3000学生送往法国。国内其他地方也仿效起来。吴玉章在四川组织了四川留法俭学会。上海以相同方式组织了留东（即日本）俭学会、留英俭学会。正当俭学会蓬勃发展之时，袁世凯公然实行反动政策，国民党的二次革命终于失败，孙中山等人被迫流亡日本。留法俭学会的命运随同二次革命而完结。李煜瀛、吴敬恒、蔡元培等人又亡命法国。方家胡同的预备学校也被关闭。

留法俭学会标榜的是为共和国而钻研学问。然而，二次革命的失败，揭示出那不过是一场梦。要救国，还必须寻找其他道路。

蔡元培、李煜瀛等人到达法国后，继续从事文化教育工作。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很快临近巴黎。蔡元培在遥远的法国，忍痛听到中国政府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二十一条”等一连串令人愤慨的消息。他反复思索，提出“劳工神圣”口号，并决定对工人实行启蒙教育。李煜瀛等则在豆腐公司等处开展“以工兼学制度”、“勤工俭学会”。蔡元培还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会是专门对华工进行启蒙教育的组织。华法教育会则是为促进中法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而设立的机构。蔡元培认为，人类最普遍最悠久的事业是教育，为普及教育，必须制定共同的规范，但在当时，由于君主和教会两大障碍而不能形成共同的规范，甚至成为助长各民族对立的工具。只有法国教育自革命成功、共和确定后，教育界已一洗君主专制和教会之遗毒，克服了君主和教会的危害。蔡元培认为法国是中国改革教育的楷模，而中国教育自孔子到黄宗羲的历史，也充满了民主政治精神，是容易学习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科学主义的。1916年6月，华法教育会正式成立。同年8月，该会发行《旅欧杂志》月刊，以向中国介绍欧洲事物为目的，特别着力于勤工俭学会的活动和华工情况的报道。华法教育会发行的《旅欧教育运动》小册子，是赴法留学的必读书，是把法国的“科学真理”、“人

道主义”输往中国的直接的途径。

1916年的法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国内劳动力极为缺乏，法国政府一方面欢迎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工人来法，一方面通过军队从非洲、越南等殖民地征收劳动力。即使这样，劳动力仍然不足。因此，法国政府决定招收华工。

“惠民公司”是法国政府公使康梯与交通银行经理梁汝成磋商后成立的，专门招募赴法华工。“招工合同”上写明华法有安家费、旅费、工资等等权利，但大多成了一纸空文。“惠民公司”总部设在北京，还在天津等地设立了分公司。从1916年7月到1918年10月，“惠民公司”分批送到法国的华工总计约3.5万人。李煜瀛受法国政府的委托，从云南、广西直接招募1200多人，带往法国。还有一些国内的失业工人，从威海卫等地出发，前往法国。通过这一途径赴法的华工人数约有10万人，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华工约有15万人。

华工到达法国后，有些被编入军队，充当炮灰，更多的被派往各工厂，从事武器、火药、弹药、钢铁、造船、军需运输等工作。到1919年战争结束时为止，大约有2万名华工牺牲在异国他乡。15万赴法华工，是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明证。

华法教育会把对参战华工教育作为它的首要任务。1916年5月华法教育会创办华工学校。蔡元培、李煜瀛等人担任教师。然而，能受到教育的华工仅仅局限于巴黎附近，人数极少。英国青年会曾派人到法国，与法国青年会一起，从事华工教育，影响超过了华法教育会。但华法教育会的《旅欧杂志》和其姊妹杂志《华工杂志》，运用注有拼音的白话文，既报道一次大战的状况和中国国内的动向，又反复教育华工通过“勤、俭、学”走向新的人生，作为“工界改良”的方法。随着华工的增加，杂志的发行量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华法教育会还在巴黎开办“翻译讲习班”，同时举办“函授科”，重新开展对华工的教育。1916年末，蔡元培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华法教育会其他成员也相继回国。从此，华法教育会开始把青年送往法国，造就勤工俭学的优秀人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正式开始。

## 二、开端

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百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改变国家命运的道路，历尽坎坷。他们曾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以为这些东西可以救中国。但事实证明，康梁的一套维新主张、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等等都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虽然使封建专制奴役下的人民群众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但是民主共和的希望转瞬即逝，中华民族仍然处于高压专断和愚昧之中。1915年，《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创刊，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文化发起了猛攻。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冲破了旧礼教、旧道德的禁锢，掀起了学习新思想、新文化的热潮。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成功给中国人民，特别是革命知识分子带来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革命先驱李大钊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先进青年开始否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点，抛弃轻视劳动的观念。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青年学生投身革命的洪流，成为运动的急先锋。在斗争时，

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即显现的巨大力量。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在国内的工读互助团，工学会等实践，都纷纷失败。青年们再一次产生了远离祖国去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想法。新生的苏维埃是最为向往的，但难以实现，只有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才允许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再加上赴法勤工俭学会等组织的倡导，于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就蓬勃兴起了。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首先着手重建赴法俭学会。发起人除前文提到的蔡元培、李煜瀛、吴敬恒外，还有马景融，蔡分时、刘鼎生、白玉麟、罗伟章、吴玉章等人。他们仍然开办赴法俭学会预备学校，还在《东方杂志》、《新青年》等主要杂志上刊登招生广告。在1917年8月，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储库营的预备学校开学时，蔡元培、汪兆铭、吴玉章等人都登台演讲，宣传赴法留学的意义。最后发言的吴玉章，详细讲述了华法教育会提倡赴法勤工俭学的目的，包括四个方面：即扩展国民教育，输入世界文明，阐述儒家哲理，发展国民经济。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赴法留学与前一阶段相比，没有增添任何新的意义，仍然处于对劳动者的启蒙阶段。

华法教育会努力把在法国产生的“勤工俭学”运动推广到全国。1917年秋，“保定各乡、村勤工俭学会初级预备学校”开业。学校主要招募农村子弟，在短暂的1年“勤工俭学”活动中，对他们教授法语，并通过实习学习一些制造技术，准备到法国“以工求学”。华法教育会还打算建立“高级预备学校”，附设于其他中学或实业学校，学时2至3年，进行法语和工业知识的教育，以期取得和法国工业实习学校一样的效果。但这种“高级预备学校”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建立。

赴法勤工俭学不仅可以如蔡元培所希望的，弥补中国教育的不足，而且可以为中国民族工业培养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因此，当时实业界人士普遍地支持勤工俭学运动。如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所长王显华、浙江财阀钱永铭、中国实业银行的李雍等都同华法教育会有关系。大批青年能够赴法并得以生活，是与国内实业界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1918年6月，湖南“新民学会”的代表蔡和森到北京了解赴法事宜。新民学会，1917年开始筹备，1918年4月正式成立。它是一个以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改造中国”为宗旨的团体。他们专门开会讨论了赴法留学事宜。蔡和森来到华法教育会，却被以“人数有限”的借口拒之门外。蔡和森决心靠自己努力创建组织。毛泽东本人也怀着到北京接受新思想的愿望，1918年9月同其他20多人一起到达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做准备。与湖南一样，四川、广东、江西等全国各地的青年，为了寻求改造社会的道路，为了赴法勤工俭学，都赶到北京询问情况。毛泽东、蔡和森与华法教育会进行交涉，在蔡元培的帮助下，长辛店京汉铁路工厂开办了留法俭学班。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及成都、长沙、上海等地都成立了这样的预备班。到1919年3月，全国成立预备班的地方达到了20余处。进入预备班学习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便开始为赴法旅费和各项手续四处奔走。在国内为赴法勤工俭学开展的各项活动，培养了青年自主、独立的进取精神，也给青年提供了一个向工人学习的极好机会。1919年4月到5月，《新青年》编辑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每周评论》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积极地介绍马克思主义。这样，当预备班结束时，青年们已经掌握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蔡和森到法国前后，已具有了无产阶级专

政的理论。但像蔡和森这样的人是极少见的，大多数勤工俭学生都像何长工那样，只有一些不太明确的社会主义思想。

赴法的旅费，三等舱船票只需 400 元，但对于贫穷的学生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研究的几种打工途径都不能实施，最后还是由北京政府或各省政府出资补助。

李煜瀛曾经在招募华工的活动中捞取好处，此刻，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他以密切中法经济、增进两国教育关系为名，组织华法协进会，行募集捐款之实。1918 年 12 月 20 日，华法协进会在江西会馆举行 1000 多人参加的成立大会。来宾有法国公使鲍宾（Boppe）、留法俭学会教师道鲁门、教育总长傅增湘、河工督办熊希龄、外交总长陆征祥的代表、前交通部长叶恭绰的代表、前财政总长梁士诒、侨工局长张岱杉等。来宾、代表的发言都宣讲中法亲善的意义。蔡元培致了闭幕词并公布捐款名单：张岱杉 100 元，李长泰 1000 元，伍廷芳、汪精卫、吴玉章等 10000 法郎。除以上捐款外，李煜瀛还用各种关系，帮忙学生借款作旅费。在湖南，经李煜瀛的介绍，熊希龄以本利达 1000 余万两的米盐公款中，给了 40 位学生每人 400 元的借款。预备学校、旅费，一系列的困难都克服了，赴法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1917 年 3 月 17 日，首批赴法勤工俭学生 89 人从上海乘日本船启程；3 月 31 日，又有 26 人出发。这里包括保定育德中学预备班、北京大学预备班等学校的学生，从籍贯上看，直隶和湖南的很多。华法教育会和留法俭学会还举办了欢送会。法国总领事及 3 个副领事、工部局的有关人员作为法国方面的代表出席并致了欢送词。高鲁、洪诚、朱少屏等人代表中方讲话。他们对于法兰西文明同声称赞，举杯庆贺，还摄影留念。在码头上，还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一些知名人士向学生们赠送了国旗徽章、书籍、杂志等等。当时上海的主要报纸《时报》对欢送会和送别仪式都作了详细报道，并称赞：赴法俭学的目的是“在海外发展我国工业势力”，反映了当时为发展工业急于进行技术教育的舆论动向。

5 月 4 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各地，赴法工作暂时停止。在预备班学习的学生们，都参加了“五四”运动。在这场伟大的革命活动中，青年们看到了自己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努力的新方向，可以说，经历了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青年们，获得了极大的政治觉醒，不再漠视“新思想”，而是十分明显地把法国当作他们寻求“救国新思想”的目标。

北京西南部的长辛店，是一个以京汉铁路车辆修理而发达的镇子，是当时北京唯一的近代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五四”运动前几天，北京大学的学生曾来到长辛店与长辛店赴法预备学校的学生一起，在工人中宣讲北京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失败，无法废除二十一条，准备在屈辱的条法上签字。5 月 4 日，长辛店的学生们骑着毛驴来到天安门，与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 10 余所学校的学生一起，到东交民巷使馆区示威游行。他们举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小旗子，在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地焚烧了曹宅。这一天，有 30 多人被捕。预备班的学生回到长辛店后，立即到工厂、车站向工人们宣讲，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反对政府签署卖国和约。6 月 3 日，长辛店工人，上海、天津的工人奋起响应学生的爱国运动。北洋政府感到单凭武力不能压服人民，遂于 6 月 10 日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28 日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的签字。至此，“五四”运动以军阀政府的妥协，学生、工人的胜利而结束。“五四”运动使这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受到了生

动的阶级教育，使他们亲身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不到1年，长辛店预备班结束。当他们离开长辛店时，他们每个人都更加明确了赴法留学的目的。

北京大学预备班、保定育德中学预备班以及其他预备班的学生，虽没有像长辛店预备班的学生那样，与工人群众关系如此密切，但经过“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洗礼，他们也突破了一般性的“劳工神圣”的认识，开始真正地感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这一时期，国内其他组织，如工读互助组织的王光祈、少年中国会的赵世炎、觉悟社的周恩来、在四川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聂荣臻、邓小平、陈毅，都陆续加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另外，“五四”运动也使中国妇女的解放获得一个契机。1919年12月，湖南的向警予、蔡畅等人在长沙周南女校组织了湖南女子留学勤工俭学会，实现“男女教育必须平等”、“和男学生一样留学”的愿望。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干事4人，设有干事部和评议部，会所分别设立在周南女校和巴黎豆腐公司。以湖南为开端，浙江、江苏等地先进的女性也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五四”运动以后的赴法留法运动，除湖南和四川进展最快外，广东、广西、河北、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青年也纷纷报名出国。华法教育会已经无力承担更多的具体工作，因此，开始充实加强作为赴法口岸的上海分会和广东分会，专门为赴法学生提供住宿、学习经费等便利条件。同时还与黄炎培设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合作，创立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通过在附属工厂实习的独特教育方法努力培养技术人材。随着华法教育会机关建设的加强，留学生出国的速度也加快了。每月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到华法教育会1921年发出停止出国的命令截止，共计约17批、1600多名学生前往法国。

### 三、裂变

在赴法勤工俭学的人中，以中学生为最多，此外还有小学生、师范生、大专学校学生、教师、工人、商人、记者等等。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是54岁的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她毅然离开了故乡，与儿子、女儿（蔡畅）一起举家赴法，去受中等女子教育。其次是43岁的徐特立，他是湖南省著名的教育界领袖，也抛弃了舒适的生活，到法国去做工。贵州省教育界知名人士，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也是如此。这些老前辈的壮举给青年一代树立了榜样。勤工俭学中年龄最小的王树棠，只有10岁。15岁以下的还有20人左右。在勤工俭学中还有一批女生，约20人。

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队伍中，涌现出众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向警予、陈毅、王若飞、李富春、陈延年、陈乔年、郭隆真、钟汝梅、刘清扬、邓小平、聂荣臻、何长工、李维汉、蔡畅、萧三等等。他们有的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英牺牲牺了，有的成了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世界观的原因，他们在留法勤工俭学过程中，并没有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而是埋头读书，成了科学家、工程师、教授或者企业家等等，在旧中国，他们的报国志向无法实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他们为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可喜的贡献。但也还有后来或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或消极颓废皈依天主的，他们成为勤工俭学生中的渣滓，被时代、被历史所淘汰。

勤工俭学大致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半工半读”，即白天学习，晚上做工。第二种“先工后读”，先工作3至6个月，积攒一定数量的钱后再专心读书。第三种“先读后工”，先用带来的钱读书，用完后再做工。也有的从一开始就去当工人，一心在工厂学习技术，也有的工读学生并非每天同时进行学习劳动，而是利用春季或夏季休息的时间集中做工。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往往取决于他们所带钱的多少。得到省里补助金的学生，大都选择了第三种方式，从1919年到1920年上半年来法的学生，资金较充裕，先读后工的多。1920年下半年，先工后读、半工半读的人是多数。

总部设在巴黎的华法教育会，在李煜瀛、萧瑜（子升）的安排下，特设“学生事务部”，用专人处理日常工作，帮助勤工俭学的学生寻找适当的学校学习，或寻找适当的职业做工，以及负责发放各省补助金、借贷和追回华法教育会单独发放的奖学金等烦杂事务。赴法华人还出资买房，建立“华侨协社”。这个设于巴黎西郊哥伦布、设有讲演室、图书室、商品陈设室的活动中心，是个名符其实的互助组织中心，一度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经常来访之地。

战后的法国，经济萧条，勤工俭学生的工作能力也很有限，所以为学生们寻找工作颇费周折。几经努力，基本上都在雷诺汽车工厂、克鲁佐兵工厂、里昂汽车工厂等地找到了工作。学习上，他们一般需要读3个月或半年就可学完课程的速成科，与留法俭学会素有交情的蒙达尔纪和文道姆、枫丹白露等10多所中学接受了大部分中国学生，有的还成立了中国学生速成科。

勤工俭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中国学生从事的多是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工资仅仅是法国工人的一半。除去生活费、学费，他们只能勉强度日。华法教育会不时地给生病、失业的学生少许救济，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大多数学生能够坚持做工，坚持学习，依靠的是坚强的意志和学好知识和技术报效祖国的信念。王若飞曾在圣夏蒙钢铁工厂做学徒。圣夏蒙黑烟滚滚，河水污浊，工人们衣着破烂。王若飞暗暗告诉自己：“粗野的劳动者，才是人类过正当生活的人，又是文明的制造者。”王若飞做的是铸造工。他每天劳动8小时，还规定自己学习5小时，并且坚持记日记。勤工俭学完全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劳动的弊病，也粉碎了知识分子爱虚荣、缺乏真才实学，过寄生生活的梦想。勤工俭学在知识和实践的结合上取得了成功。徐特立高度赞扬勤工俭学运动，李煜瀛也颇为得意。但王若飞的观点却不太相同：

“我非不知劳动为自己对人类应尽之一种义务，劳动为良心上平安的生活，劳动是愉快的事业，对于劳动而生痛苦观念是很可耻的事。但是，现在这种劳动，完全是替别人做事，拿劳力卖钱，不是自动自生的劳动。”

勤工俭学的出路是什么呢？工人中的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1920年6月，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生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法国经济衰退，物价高昂，勤工俭学生们的生活极为贫困，华法教育会又置之不管，致使双方矛盾加剧。1921年2月28日，勤工俭学生提出“求学权、劳动权、生存权”的口号，包围了中国驻巴黎公使馆。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为“二八斗争”。

1920年，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高达6600多人，几乎人人都希望找到工作，但由于经济的不景气，缩短工时、停工、大批解雇工人的浪潮席卷整个法国，因此不太懂法语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就业率更低，实际能找到工作的不

过 500 人。失业与通货膨胀紧密相连，勤工俭学生的旅费不断贬值，加速了他们的贫困。当时的房租、伙食费、被服费、学费、书籍费平均上涨 4 倍，中国学生往往是把 1 天的食物分作 3 天来吃，即使如此，也往往靠借贷度日。因病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在此危急时刻，华法教育会于 1921 年 1 月 6 日，突然宣布停止向勤工俭学生提供经济援助。

华法教育会的财政问题由来已久，停止救援也是必然。华法教育会本身没有收入，只是依靠个人捐款。随着时间的推移，贷款和经费开支不断上涨。1920 年 10 月前的 15 个月，经费开支为 4.8 万法郎，贷款 46 万法郎，而 11 月到 1921 年 1 月，3 个月时间，经营开支便达到 4 万法郎，贷款竟达 32 万法郎。李煜瀛、吴敬恒等人均相继回国，在勤工俭学生处境最困难时，没有一个勤工俭学的倡导者留在法国。具体办事的向迪璜等人不仅摆官僚架子，对学生颐指气使。还更为严重的是，刘、向负责的华法教育会会计帐目不清，大肆贪污学生补助款。1920 年 4 月，湖南省政府捐赠勤工俭学生 10 余万法郎补助款。《旅欧周刊》也刊发了消息，可直到 1 年后，华法教育会才开始发放这笔款子。1921 年，北京政府拨款 10 万元救济勤工俭学生，华法教育会的职员绞尽脑汁，利用虚报人数、强征横敛的手段，从总值 73 万法郎中侵吞了 12 万法郎。对华法教育会的问题，吴敬恒等人佯装不知。1921 年 1 月，蔡元培出国考察欧美教育，来到法国。他不仅拿不出解决方案，反而听信谗言，以“勤工俭学生来法国者，多不合所订条件”、“无勤工之志”为名，决定停止开展勤工俭学活动。

蔡元培的电报发回国内，其反应必然不是采取措施救济，而是强烈主张遣返勤工俭学生。接着 1 月 12 日和 16 日，蔡元培又两次向全体勤工俭学生发表“通告”，宣告停止经济援助。蔡元培的所作所为令学生们极为失望。1 月 26 日，学生代表见到了与蔡元培同行，却无任何权利的李麟玉。李敷衍学生说：“教育会已宣布两个月后和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他还转嫁责任：“诸君，应向公使馆、领事馆请愿以图维持。”蔡元培早已躲到比利时，学生们只好把斗争矛头指向驻巴黎领事廖世功。1 月 28 日，学生们提出，希望领事馆暂时每月发给勤工俭学生相当于官费留学生费用一半的 400 法郎，廖世功不屑一听。学生又使新任公使陈篆提出了要求，陈篆也没有明确的答复。旷日持久的交涉，使学生们日益穷困。2 月 27 日，公使馆接到北京教育部电报，指示将“勤工俭学生无力自给者遣送回国”。这无异是最终判决。

危急时刻，蔡和森、王若飞等人组织的“工学互助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的学校以拖欠学费为名勒令学生退学，工学互助社向各地勤工俭学生分发印刷品，号召他们奋起斗争。工学互助社还揭露了华法教育会和公使馆的不负责任，剥夺贫穷子弟求学权的阴谋。2 月 27 日，工学互助社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召开了“赴法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驳斥对于勤工俭学运动的中伤、非难，提出了有利于勤工俭学运动的“劳动权、求学权、生存权”的口号，并决定次日到公使馆进行请愿。

2 月 28 日，从法国各地来到蒙达尔纪的学生，在蔡和森、王若飞及向警予的带领下，开始向巴黎的中国公使馆进发。但巴黎警察署收到一封匿名信，将消息通知了中国公使馆，并派大批警察将公使馆包围起来。学生们无法进入公使馆，只好推举包括向警予在内的 11 名代表会见公使陈篆，其他 300 多人在附近在公园待命。

学生代表要求：“无论如何，必达勤工俭学目的。请求政府每月给费 400

法郎。”陈策声称“无答复之权”。谈判僵持不下。午后，陈策被迫到学生们面前亮相，却仍坚持不能答复。愤怒的学生向他涌去，陈策仓皇逃走。法国警察袭击学生，将学队伍冲散。学生代表们被拖出使馆，并被警察带走。陈策怕事态扩大，又请求警察释放了被捕学生。

“二八斗争”由于遭受武力镇压失败了。腐败无能的官依靠帝国主义，用武力镇压正义学生，是当时国内中国人民遭欺凌的一个缩影。通过这次斗争，留法俭学生们认识到，法国，也如同在中国一样，军阀统治无所不在。

而法国政府则认为勤工俭学生扰乱了法国社会的秩序，一些狂热分子叫嚣：“那帮中国学生，都是些要革命的人，非赶快想办法对付不可。”法国舆论界批评中国政府未采取救济措施，就提出强行遣返的方针。陈策迫于法国政府和舆论的压力，只好提出三项解决办法：一、对业已入学者暂时给予一个月的补助；二、对失业者除每月发给生活费外，设法与工商界联系安排就业；三、对志愿回国者给予费用准其返国。这一解决方案虽不完善，但总算使勤工俭学生勉强渡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时期。

“二八斗争”刚刚平息。5月14日，中法两国政府正式成立了以救济俭学生为目的的“中法委员会”。中国方面由在袁世凯手下任过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的朱启铃任名誉会长，陈策任名誉副会长。蔡元培及巴黎总领事廖世功等人任委员。法国方面由前总经理潘鲁维任名誉会长，教育部代表别兰、商工部代表皮克娜尔、法比银行代表康恩、东方汇理银行代表圣·皮彼尔等人任委员。中法委员会实际是从3月份开始工作的。在5月14日的大会上，收支决算说明，收入的一半业已用作救济金了。若发给2000名勤工俭学生的旧国船费，就必须准备多达240万法郎的资金。不仅是强制学生回国，就是“中法委员会”本身也面临着夭折的命运。

那么，法国政府为什么要救济中国勤工俭学生呢？原因在于法国试图抵制美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正如法国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潘鲁维所说的：为了防止法兰西文化从远东被驱逐出去，法国应当坚持对中国青年的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从中国被挤了出去，美国、日本大举推进。美国甚至用义和团赔款为基金，加大了清华大学的留美事业。法国期待从2000名勤工俭学生上取得不次于美国的清华大学留美事业的“成果”。

中国政府之所以同意救济勤工俭学生，则是为了向法国借款，即历史上的“善后大借款”。纸包不住火，1921年6月中旬，由于法国大银行之间因分摊不均，中法秘密借款之事被法国报纸披露。借款总额为5亿法郎，“以全国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以滇渝铁路建筑权、全国实业购料权作交换”。对此，旅法华人无不义愤填膺。王若飞、李尉农、张增益等人印发传单，各华人团体多次集会。1921年6月30日，巴黎300多华人，主要是勤工俭学生会和工人举行拒款大会，反对中法秘密借款，并对双方正在进行的此项谈判表示抗议。法国政府仍以拉拢为手段，将学生的救济款发至学校。正在此时，传来中法已于7月25日草签协约的消息。勤工俭学生们又一次包围了公使馆，和华工一起火烧了公使馆。8月13日，旅法各界华人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迫使使馆一等秘书王曾思立即向法国外交部声明反对5亿法郎大借款。在各界华人的共同努力下，秘密借款终于流产了。气愤之极的“中法委员会”在9月初宣布，从9月15日起停发维持费，送学生入学的许诺也随之取消。这实际上是把大批勤工俭学生推进绝境。中外反动派的阴谋并未就此止步，勤工俭学生的斗争也没有停止。

被人称作“现代墨子”的吴敬恒，是勤工俭学的倡导者之一。他认为，勤工俭学只能培养中、初级技术人员，只有大学教育才能培养高级人才。他在《海外中国大学未议》一文中，力陈到海外，尤其是法国办大学的好处。他的想法得到了蔡元培、李煜瀛、里昂商会、里昂医科大学校长列宾等人的支持。护法军政府总裁兼内务部长岑春煊，总裁兼外交部长任廷芳、广东军阀陈炯明等人提供了资金援助。大学校址设在里昂西郊的圣迪列涅，命名为里昂中法大学。由于政局变动，陈炯明被孙中山消灭，经费筹措紧张，办学规模不得不缩小。中法大学只能充当里昂大学的补习学校和宿舍，学校规格降低，招生人数也由 700 人减少到 150 人。

起初，得知创办里昂中法大学的勤工俭学生们都又惊又喜。但吴敬恒根本没有把勤工俭学生考虑进去。他不仅需要招收军阀子弟，而且还宣称与华法教育会无关。1921年6月6日，当得知吴敬恒在国内另招的学生即将来法时，以王若飞为首的工学互助社召集了250名勤工俭学生，举行集会，要求把里昂中法大学改为“工学院”，招收勤工俭学生。8月底，当吴敬恒已带领学生启程的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各地的学生便将等待主义改为斗争主义。克鲁佐的学生们首先发表了战斗檄文。强调勤工俭学生里有优先进入中法大学的权利。排除勤工俭学生，就是抛弃海外平民教育，势必恢复到以前贵族教育的局面。这一檄文，得到各地勤工俭学生的热烈响应。9月5日，学生们再次发出通告。9月17日，学生们斗争情绪更加高涨，通过了“以开放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的决议，确定把勤工俭学总会迁往里昂中法大学，进军里昂，强行占据中法大学。

17日决议决定，进军里昂的总司令部设在巴黎。哥伦布、蒙达尔纪、夏多迪埃利、枫丹白露等地同学，组成先发队，于9月20日晚8时35分和9时55分，分两批由巴黎前往里昂；并决定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总办事处与先发队同日移往里昂，只留委员5人为驻巴黎代表。21日晨来自巴黎和各地的学生在里昂会合了，人数总计约250人。他们以圣迪列理为进军目标。蔡和森担任前线总指挥。克鲁佐运动团的李立三，以及李维汉、陈毅、赵世炎、向警予等人也是这次进军的指挥者。这些人中的100多人组成先发队，大部分由留在巴黎的周恩来和王若飞负责招集。

9月19日晚，即先头部队进军里昂的前一天，学生代表王若飞等人到公使馆会见陈篆，坦诚告诉他要在国内新生到来之前，进入里昂大学以求解决，并要求陈篆出面向法国政府交涉。狡猾的陈篆不仅装模作样地替学生出主意，叫学生搬进里昂大学住下再说，还假惺惺表示慷慨拿出2000法郎作为先发队赴里昂的路费。学生们知道，陈篆肯定心怀鬼胎，但又觉得“失此机会不图，以后再也没有争回里大的希望，勤工俭学的根本问题亦舍此无法解决，故仍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奋然去做”。其实，陈篆背后，有着更为狡猾的法帝国主义。在法国公使给本国公使的电报中，宣称“我们要做到对这一遣返不负任何责任，重要的是把当事者的愤怒引向他们的政府”。不论是对北京军阀政府，还是对法帝国主义，进军里昂都是他们将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一网打尽的绝妙机会。

先发队到达里昂中法大学时，校方早已严加防范，各处房门全上了锁。先发队员只好在草地上待命，派代表与中法大学副校长褚民谊进行交涉。褚民谊不仅立即拒绝接见学生代表，还凶残地给学生们加上“无钱、无学、革命党”的罪名，通知警厅予以拘禁。午后4时半，二三百名警察包围了里昂

中法大学，没收了先发队员们的随身带的护照。使得他们无法行动。当晚，学生们在学校的空房中过夜。次日，警察逮捕了所有学生，把这些学生拘禁起来。留在巴黎的王若飞、周恩来等人得知全体先发队员被捕的消息后，立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首先营救被捕学生。周恩来和王若飞恳请勤工俭学生的两位长者徐特立和黄齐生，去与有关当局交涉。徐特立和黄齐生来到里昂，见到了带领新生刚刚抵赴法国的吴敬恒。吴敬恒破口大骂：“勤工俭学生不守纪律，无办法，筹款不成问题。”徐特立又说：“不守纪律是由于失业，不能求学，又不能生活下去。有钱必然有办法。吴先生对于筹款的方法怎样？”吴敬恒答道：“我已写信给陈篆要他筹款。”吴敬恒是一个在野的名流，陈篆是国家的公使，吴敬恒有什么权利命令公使筹款呢？这肯定是个骗局。

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会驻巴黎代表要求陈篆从速派人前往里昂，与法国交涉，取消拘禁。副领事李骏受陈篆派遣，于23日晚到达里昂。名义上、李骏是来保释先发队的同学们，实际上却受陈篆指使，暗中破坏。自从他到达里昂后，警察对学生的监视更为严格，原有的一些行动也被取消了。此时，这一事件又由里昂地方移归外交部处理，问题复杂化了。29日，李骏回巴黎复命。

吴敬恒虽一口咬定里昂中法大学绝不能解决勤工俭学问题，也就是说绝不能对勤工俭学生开放，但为了拖延时间，仍然同勤工俭学生进行谈判。10月3日，谈判地点从里昂迁到巴黎，吴敬恒召集章士钊、高叔钦、李骏、郑毓秀商议后决定，仍不能答应勤工俭学生开放里昂中法大学的要求。作为妥协，他们提出4项方案：即（一）章士钊在国内搜集9万元捐款；（二）公使向政府要求每年3万元的援助；（三）其款项交由公使馆掌管发放；（四）设法在克鲁佐安排500学生就业。这种妥协方案似乎有难度，但对于吴敬恒这一“在野的名流”却不成问题。因为，这只是在勤工俭学生被遣送回国之前，故意转移视线。北京军阀政府因为勤工俭学生的斗争，中法秘密大借款未能实现，使大总统徐世昌这个巴黎大学的博士恼羞成怒。法帝国主义政府也决心报复中国。在公使馆打给北京外交部的电报上，给被捕的勤工俭学生加上“扰乱治安”的罪名，要求强制遣返国内，并要求中国承担1万元船费。由此可见，中法两国统治者的态度是早已确定了的。

10月10日，被拘捕的100多名勤工俭学生绝食一天，对他们“无辜受辱”表示强烈抗议。联合委员会驻巴黎代表为此再次会见陈篆，要求他“严重向法政府交涉，恢复学生自由”。陈篆未予理会。11月，里昂的警察和法国外交部代表又来到兵营查点被捕学生名册。12日，里昂警察强迫学生填写履历表。13日，104名勤工俭学生被塞进装甲车，在里昂车站又被转换到另一特别列车送往马赛。最初被逮捕的学生，大约是125人，到被遣送时，逃跑了一些，只剩下104人，这其中包括蔡和森、向警予、陈毅、李立三等革命家。赵世炎当时是学生代表，出营交涉，得以逃脱。14日晨，列车抵达马赛车站。车站上全部戒严，刀枪林立。闻讯而去的学生无法交谈。中法大学的副校长褚民谊还在暗中监视学生们的举动。勤工俭学的学生被直接押进法轮宝勒加号的无等舱。船上还派有一名法国军官和8名法国士兵押送。这一天，正好是中法委员会停止发放补助款的日子。

归国途中，这些勤工俭学生们受尽了苦难。他们从马赛动身时，事前都没有准备，也没有带行李。没有换洗衣服，没有书籍文具，没有钱，一个多

月的航程，天气时冷、时热，身体忍受着折磨，心里还惦记着留在法国的 1000 多伙伴。他们向国内外同胞呼吁：我们此次回国同学，都是留法的学生推举的代表，都是为了谋求读书学习问题才被迫害的。现在我们虽回了国，可在法国的还有很多同学，希望大家为他们的生活考虑，捐款捐物，资助他们早日学成归来，报效国家。

陈毅的心情是沉重的。路过地中海时，他愤然写下诗句：

我今东归，  
归向那可爱的故乡，  
故乡是我的情人，  
不知他而今怎样？

欧陆的风云苍茫。  
一股横流东向，  
妙手空归的我呀！  
怎好，怎好还乡。

去国的壮怀，  
只如今头垂气丧，  
曾记否少年的肩头，  
应担负什么分量？

真不堪回想，  
这五年的流浪！  
践踏了父母的血肉，  
狼狈在地中海上！

周恩来在秘密大借款时，就接连撰写详细的通信寄回国内，向全国人民揭露北京政府和法国政府的肮脏交易。现在，他又奋笔疾书，写下《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一文。文章忠实地记录勤工俭学生进军里昂的始末，对学生们的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对中法政府的无理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并呼吁全社会给予有力的声援。文章精辟地分析了勤工俭学生们求学不得，工作不能，被押解回国的原因，是一篇在留法勤工俭学史运动史上极为珍贵的文献。

经过 1921 年的“二八”斗争及反对中法秘密大借款和争回里大的斗争，广大勤工俭学学生受到深刻的教育。

首先，勤工俭学的理想在当时的现实社会里是很难实现的。如果没有社会制度的变革，纵然个人奋斗的力量无穷，也只是以卵击石。无论是实行工读主义还是勤工俭学主义，都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社会革命才是唯一出路。

其次，通过法国政府在对待勤工俭学生的态度上，认识到了帝国主义所鼓吹的“中法文化运动”的欺骗性。在“二八”运动时，法国为了拢络中国青年，抵制美国文化渗透，曾反对北京政府遣送学生回国。现在，因中法借款阴谋没有得逞，立即驱逐学生。一前一后的变化，只能说明所谓“中法文化运动”原来是经济文化侵略的假面具。

再次，勤工俭学生们认识到，在反对和驱逐勤工俭学生上，中法反动派的利益和步调是完全一致的。陈篆为了卖国求荣，将勤工俭学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蓄谋已久。里昂中法大学的当事人吴敬恒、褚民谊等为了自身利益也希望赶走勤工俭学生。法国帝国主义以其警察机关等国家机器做帮凶，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总之，法国政府、陈篆与北京政府、里昂中法大学这三方面互相勾结，串通一气。他们都是迫害勤工俭学生的反动派。因此，必须与中外反动派做彻底的斗争。

最后，勤工俭学生们由此认清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同时还认识到通往胜利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他们没有想到，号称自由，高唱人权的法兰西，竟然用武力镇压学生，竟然出现这种无耻、卑劣的举动。他们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法兰西，是为追求光明而来的，却仍然被邪恶、强权所左右，光明在哪里呢？

勤工俭学生们一边思索，一边总结经验。但学生们有信心，相信“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没有屈服，没有颓丧，而是准备更加英勇、机智地进行斗争。

押送学生的法轮到达香港时，蔡和森、罗学瓚、张昆弟、李立三等 27 人离航登岸，去了广州。陈毅与另外 77 人于 1921 年 11 月 25 日抵达上海。留在广州的 27 人于 12 月中下旬也来到上海。

在陈策和法国政府的迫害下，1921 年 10 月 28 日和 11 月 11 日，又有两批勤工俭学生被迫回国。第二批 6 人，第三批 29 人，都于 12 月抵上海。向警予就是第三批回国的。

这三批勤工俭学生在上海，继续为解决生存和求学问题开展积极的呼吁和斗争。他们据理力争，以事实为依据，向全社会揭露了中法反动派互相勾结对他们进行的一系列迫害，赢得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这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夏日的一天，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共 14 人，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聚会，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归国的勤工俭学生面对黑暗的社会、腐败的政府，进一步意识到肩负的救国责任的重大，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立即加入了新生的共产党和共青团，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蔡和森、向警予在党中央担任了领导工作；李立三、张昆弟、罗学瓚到铁路、矿山去从事工人运动；陈毅先回四川想办法解救被困法国的同乡，随后去北京从事革命活动。鲁易、吴明南下广东、海南从事军事运动。还有一些人再度赴法。如王京歧，第二次到法国后，与周恩来一起，在旅法各界人士中积极做统一战线工作，为革命做出了一定贡献。

里昂进军失败了，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里昂进军标志着前一阶段勤工俭学运动的结束。对于勤工俭学生来说，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斗争，是比勤工俭学更为迫切的事情。这一阶段勤工俭学运动的结束，标志着勤工俭学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1921 年留法勤工俭学生所进行的三大斗争，促成了其中先进分子的新的觉醒，他们认识到建立一个战斗组织的必要性。几个月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诞生了。从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 四、新生

伟大导师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勤工俭学生远涉重洋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彻底改造旧中国的道路，因此他们不仅坚持实践斗争，还必须坚持理论斗争。在一系列思想斗争过程中，逐步了解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最早的争论是围绕如何评价十月革命，以及怎样把十月革命的经验同改革中国现状结合起来展开的。这一争论首先在蒙塔尔纪的湖南留学生中进行。这些湖南留学生中有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在国内就有一定的思想和认识基础，其中最著名的是蔡和森。蔡和森因为法语会话欠佳，便注意读报纸、书籍和欧洲各国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知识，以提高法语能力。他还计划用一年时间，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队及国际共产党弄个明白。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到法国几个月内，就“猛看猛译”了百余种马列主义小册子，思想觉悟大幅度地提高。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认识到打破中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必要性。他运用列宁的这个基本理论，严厉地批判了修正主义将中产阶级的唯理主义当作唯物史观的错误。而当时国内的《新青年》，还把修正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蔡和森的见解走在时代的前列。

蔡和森还彻底批判了张君勱一派的改良主义思想以及工团主义的放弃政权思想。1920年7月上旬，新民学会法国分会把13个会员召集到蒙达尔纪，围绕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议题，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讨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次会议伪装成一次郊游。会议争论的焦点是明确而集中的：是靠革命救国还是靠改良救国？以蔡和森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方法、手段类似俄国十月革命；而以萧瑜为首的“少数派”主张实行改良主义，温和地革命，也就是用教育作为工具，走工会、合作社的道路。萧瑜不承认中国有爆发革命的可能，只需缓慢的改革。同时罗素的“教育革命论”在当时也颇有市场。选择哪一种道路的争论多次发生。有的会员就写信给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毛泽东回信，明确表示坚决支持革命派，深切赞同蔡和森的主张。他说，罗素的教育革命“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现有教育都是资本家的，不可能改革。

蔡和森还对无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模式作了进一步探讨，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无产阶级专政是“现世界唯一制胜的方法”，主张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改造世界。在蔡和森的努力下，蒙塔尔纪工学世界社由信奉实业救国转而信仰马列主义，在1921年的三大斗争中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

蔡和森考虑的最多还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和方法。1920年5月至9月，他先后给毛泽东写了3封长信。他认为必须成立政党，因为他是革命斗争的发动者、宣传者、作战部和中枢神经。他还提出建党的具体步骤，严格挑选党员，出版党的刊物，调查国内外情况等等。这些意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都提供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蔡和森于1921年12月回国不久即加入共产党。1922年，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长期担任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主编。邓小平为《蔡和森文集》题辞：“蔡和森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对蔡和森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继蔡和森之后，另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的领袖是周恩来。周恩来是作为第

15批成员，1920年12月抵达法国的，时年22岁。在此之前，周恩来曾东渡日本，寻求可用来“济世穷”的学问，失望而归。回国时正逢“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投入斗争中去。先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随后组织“觉悟社”，大张旗鼓地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组织游行示威，焚烧日货。为此，他被反对当局逮捕。出狱后，为了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欧洲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主张，随着留法勤工俭学的大军来到法国。与别人不同，周恩来未到任何工厂做工，一有时间他就思索问题，撰写旅欧通信。从1921年12月到1924年7月，3年半的时间里，周恩来奔走于法、英、德、比等国，考察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状况，了解世界形势，发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领导旅欧华人反帝反封建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所写的通信，内容详实，见解精辟，范围广阔，体现出一个先驱者的远见卓识。

在1921年的3次大斗争中，周恩来一直积极地参加。尤其是在里昂进军运动中，周恩来还以冷静的头脑，提醒大家：斗争是复杂的，要避免陷于绝境。斗争要讲究策略，要作两手准备。他还建议各团体留下一部分骨干，以便负责后方工作和准备以后的斗争。事实证明，他的提醒是非常必要的。

“先发队”被遣送回国后，周恩来振臂高呼：“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昂格斯（即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学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周恩来曾经与赵世炎等人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比较各种主义，最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5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作出决定，将周恩来和其他“建党前的党员”的党龄改为从1921年算起，同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一样。蔡和森、李立三等被押送回国后，为了把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团结起来，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相约，分头进行准备，筹建旅欧共产主义小组。

1922年3月，周恩来到德国后，仍经常往来于柏林、巴黎之间，在勤工俭学生中作演讲，积极推动共产主义小组的建设工作。赵世炎在进军里昂的斗争中，侥幸脱险，但护照被里昂警察没收，无法在都市藏身，便来到华工最多的法国北方做清理战场的苦力。在这里，他多次向旅居德、比、法或国内的朋友写信，详细询问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情况，还要求将党的重要文件、团章和团的印刷品寄给他。关于团员的标准，赵世炎讲究既严格挑选又讲求没有遗漏。他首先争取陈延年、陈乔年加入团组织。4月，赵世炎收到周恩来、萧三、刘清扬等7个党员的联名信，要求“五一”前成立旅欧青年团。他秘密地回到巴黎，在蒙塔尔纪、里昂多次奔波，因事情繁杂，5月底筹备工作才胜利完成。

1922年6月初，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诞生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代表18人，其中包括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子璋、刘伯坚、傅钟、余立亚等。周恩来专程从德国赶来参加会议。会议租用了一家露天咖啡茶座的18把椅子，在一块空地上开会。这样的环境，即使警察来了，也没关系。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报告了筹备经过，周恩来报告组织章程草案。会议连续开了3天。决定将组织定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

党”，通过了章程和工作计划，并选举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 3 人组成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后来又增补王若飞、陈延年、尹宽为执行委员。党部设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 17 号一座旅馆内。

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前一个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成立。10 月，旅欧中国少年党举行总投票，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 11 月下旬，他们派李维汉携带公函向团中央汇报工作，并正式提出：愿作它的旅欧支部。正在等候签发时，他们听说中国代表团也派人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会议，现已抵达莫斯科。他们立即去信致意，并说明自身情况。1923 年 1 月，团中央来信，希望旅欧少共“依中央第十次会议决议国外组的办法加入青年团”。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复信，建议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名为执行委员会，并对他们在欧洲的行动方略作了指示。

1923 年 2 月，少共于巴黎郊外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团员已由原来的 30 余人发展到 72 人。会议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将原来的中央执行委会改为执行委员会。经过 4 天的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并选出新的 5 人执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刘伯坚、袁子贞等 3 人为候补委员。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 12 人被中共中央调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执行委员会下设共产主义研究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华工委员会和出版委员会，由书记以外的 4 名委员负责。会后，周恩来向团中央作了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激动地写道：“我们现在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士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答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入党后，在 1922 年 11 月，同张申府一起在德国介绍了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到莫斯科后，除参加党的工作外，还介绍王凌汉、袁庆云两人入党。赵世炎曾在一次报告中说：“本党在西欧的活动无非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现在留在西欧的还有四五个党员。”可以说当时的欧洲这个共产党小组是附在团组织里的。一切公开活动，党组织从不出面，都用团的名义。当时我党在西欧的党员很少，因此只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下设德国组、法国组等，并没有成立总支部。陈独秀在 1922 年 6 月 30 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当时全国党员共 195 人，其中旅欧的除留俄 8 人外，共有 10 人，即留法 2 人，留德 8 人。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周恩来领导下，于 1925 年初发展为 300 余人，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到 1925 年底，又因团员陆续赴俄或归国，减少到 100 余人，组织名称又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地方团”。他们的主要活动内容是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即“学共产主义”。他们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青年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并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发展团员。这一组织，在团结和教育广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为革命培养人才上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它的成立，是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成果。

为了有力地对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宣传和解释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为了同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1922年8月1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办公理论刊物《少年》。

《少年》由陈延年负责编辑、出版，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从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后，周恩来从德国返回法国，住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7号那间5平方米的斗室里。他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依靠稿费为生。《少年》杂志的社址也就在这里。这个刊物最初是16开，每月一期，每期30页左右。以第7号起，改为24开，42页。第10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

《少年》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因此刊登了很多理论文章。如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告少年》（即《青年团的任务》）等译文，还刊登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文件和消息。

鉴于建党建团初期，一些人对党、团组织还有模糊认识，因此《少年》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讲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建团基本原则，宣传建党建团的基本意义，论证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肯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周恩来在《少年》上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告工友》、《十月革命》、《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等等。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周恩来分析了中国的经济状况，总结中国根本不具备发展民族资本的条件。如果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实业，不仅会使中国变为舶来品的市场，而且会使中国布满了外国资本家。不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都是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我们绝对不能容许资本主义在中国生长和发展起来。我们必须齐心合力搞革命，将政权夺到无产阶级手里，然后办实业，发展经济。

周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这篇文章里，还对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如国家社会主义、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法国工团主义等等，进行了猛烈批判。

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旅欧学生中占有很大市场。它宣称“绝对平等”、“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等主张，迎合了当时青年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在“五四”前后，它在冲击各种旧思想对人们的束缚时曾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它主张取消对个人的任何约束，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符合实际的空想，而且也不利于集体的团结、合作。巴黎是无政府主义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它的刊物《新世纪》从1907年6月到1910年5月，出版120期，产生过巨大社会影响。1922年1月，一些旅欧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又在这里创办《工余》月刊，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大肆鼓吹无政府主义并散布反马克思的谬论。《少年》决心给《工余》的反动言论以迎头痛击。

首先，共产主义者强调，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约束的主张是空想的，而且是有害的。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如果是一盘散沙，就不可能翻身做主人。只有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刚到法国时，对无政府主义也曾有过同情，但不久就看清了真相。他十分重视自觉的纪律，但又坚决反对盲目的迷信。有些无政府主义者讥笑共产党人的信仰是宗教迷信，对此，周恩来坚决地进行了驳斥。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争的焦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工余》发表了很多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夺取政权以及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的谬论。《少年》则发表《一个无政府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的谈话》、《什么是无政府党人的道德》、《工人与政治》等文章，对《工余》的谬论予以还击。这些文章当时在反对无政府主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2年12月1日，《少年》第5号出版了俄罗斯革命5周年纪念专号。周恩来专门写了《十月革命》一文，对俄国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做了高度评价，称赞“俄国十月革命确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奠定了革命始基。”在《少年》第6号上，周恩来又发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一文。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一文中，对俄国革命的否定和对新经济政策的恶毒攻击进行了驳斥，捍卫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

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等人在华工中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帮助华工摆脱行业、帮会的剥削，建立起工人自己的组织——华工总会，并出版《工人旬报》、《新工人》等。周恩来撰写了《论工会运动》一文，论述了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组织以及党与工会的关系等问题，对工会的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指导。无政府主义者多次阴谋破坏华工与勤工俭学生的团结，篡夺对华工的领导权，都未能得逞。由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的坚决斗争，无政府主义以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这一斗争保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的传播，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走到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到1923年底，无政府主义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

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击退无政府主义的进攻，发动和唤醒广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等等方面，《少年》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胜利地完成了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从1924年2月1日起，《少年》改组为《赤光》半月刊，开始了它的新的战斗历程。

当旅法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活动热火朝天时，中国国内的形势也风起云涌。共产党、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断地摸索革命道路，很快就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想取得无产阶级的解放，先决条件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一任务异常艰巨，只靠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还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1922年6月，即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时，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正式提出要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联合阵线。同年8月，又召开特别会议，原则确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正式开始，标志着中国革命的各民主阶级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的结成，标志着中国革命高涨的兴起。

1922年9月，《少年》第2号上发表张申府的《中国共产党与目前政府》，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不久，孙中山派王京岐到法国组织国民党支部。王原来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因参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与蔡和森等人同船被

遣送回国。他到法国后，立即与周恩来取得联系。1923年3月10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举行年会，会上，大多数人同意加入国民党或与国民党进行合作。4月25日，王京歧给国民党本部写信，报告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0多名，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事。6月16日，周恩来等3人来到里昂同王京歧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周恩来还给王京歧写信对如何实行合作，提出了切实的建议。不久，国民党本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随着国民党员人数的增加，11月25日，在里昂，国民党成立了旅欧支部。会上，选举王京歧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王京歧回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长，主持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

在此期间，旅法华人还开展过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斗争。1923年7月15日，22个团体、600多华人在巴黎聚会，周恩来发表演讲。他强调，“中国的事情之所以严重到今天这种地步，完全是由于我们受资本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会上还散发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当晚，各华人团体又派代表聚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周恩来被选为中文书记。这样，所团结的爱国民主力量就更为广泛了。

恰在这时，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将机关刊物《少年》改组为《赤光》。

《赤光》与《少年》相比，更侧重于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中国的黑暗事实，阐述那一历史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方针，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也就是说从理论转向实际了。《赤光》是半月刊，16开本，每期12页左右，出版周期缩短，《赤光》的文章短小精悍，笔锋犀利，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它的印刷份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也广泛一些。

周恩来一直主持《赤光》工作，直到归国前夕。他撰写的文章数量最多，内容也最深刻最有分量。在《革命救国论》一文中，周恩来彻底揭露了“左”和右的所谓救国途径的反动本质，充分肯定只有革命才是挽救中国的唯一正确道路。要革命，首要的问题就是分清敌友。周恩来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在国内的走狗、封建军阀及一切卖国贼都是我们的敌人。全中国的劳动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等才是我们的朋友。并且，无产阶级要想取得胜利。还应当与国际上其他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周恩来在《赤光》里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进行了大量揭露。他还告诫革命群众在北洋军阀的内江中要提高警惕，要严防帝国主义和军阀合谋破坏统一战线。

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小平、李富春、萧朴生等人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等问题，也在《赤光》上撰文作了深入的和有力的揭露。邓小平是1920年10月到法国的。在法国警察局的档案中，只有邓希贤的名字，邓小平只是在他旅法末期才开始出现。邓小平到法国时年仅16岁，也还没有明确的思想动机。他曾到学校补习过语言，从1923年6月到1926年1月他离开法国时止，他都在比扬古雷诺汽车厂做工。1921年的进军里昂运动，邓小平也积极参加了。1922年加入青年团，1924年成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支部成员。《赤光》杂志创刊后，邓小平协助编辑和撰写文章。他还经常油印传单等印刷品，因为工作认真、熟练，被亲切地称为“油印博士”。由于周恩来是《赤光》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之一，邓小平有幸经

常见到他。和蔼可亲的周恩来非常喜欢邓小平这个小弟弟。

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对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工农力量的增长，恐惧之极。在法国。旅欧中国共产主义者和革命群众与一小撮国家主义派以及国民党右派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是旅法的少年中国学会右翼分子曾琦、李璜等人。他们都是中国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利益的忠实维护者。他们所信奉的国家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共反苏反革命的法西斯主义。当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形成后，他们以《先声》周刊为基地，接连发出一连串反共反苏、反对统一战线的恶毒攻击。《赤光》奋起反抗。

周恩来撰文首先说明了革命人民所进行的救国运动和国家主义的“爱国主义运动”的本质区别，并对后者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国家主义派千方百计破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共产主义者则坚持斗争，直至其理屈辞穷，张口结舌。国家主义还造谣、中伤，硬把中国共产党当作“国贼”，把社会主义的俄国当作“强权”，叫嚣“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等同志都对此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真理愈辩愈明。在《赤光》与《先声》的论战中，勤工俭学生、华工以及国内的进步人士都逐渐认清了国家主义的反动性，国家主义派的影响越来越小。1924年9月，曾琦、李璜等人归国，国家主义派的活动中心也移到国内。在与《先声》的斗争中，《赤光》大获全胜。

除了1923年的反“共管”中国铁路运动以外，1924年、1925年旅法华人还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4年12月，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琪瑞派军阀徐树铮访法，与法帝国主义磋商大借款和金法郎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于12月29日发出《为徐树铮来法告旅欧华人》一文，号召旅欧华人“竭力反对”，使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的阴谋不能得逞。12月31日，赤光社等25个团体联合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法国帝国主义和皖系军阀合作的决议。只有青年党签名后又取消签名。其他团体都站到了革命派一边。

1925年6月，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法国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和中国国民党留法总支部立即联名向旅法华人发出号召。6月7日，28个革命团体代表集会。决定6月14日上街示威游行。这次会议，还邀请了法共代表多利奥、德共国会议员玛第以及越南共产党留法组织的代表阮世传。

6月14日，800多华人准备集会，与法国警察遭遇，后改变会场才得以举行。但有9人被捕。6月21日，200余名决死队员分乘二三十辆汽车冲向中国公使馆。他们切断了公使馆的电话线，断绝了公使馆与外界的联系。爱国群众历数陈篆7大罪状，并向他提出3项要求：“一、对上海方面去电于工人、学生、商人，对此运动应坚持到底；二、对法报界及欧洲应发宣言，说明此运动非排外，实英日等国所造成；三、对英日等国应严重抗议，并对法政府撤去在华军舰，及在巴黎华人有集会结社出版示威之自由权。”陈篆被迫签字认可。但是，闻讯而来的警察仍然逮捕了未来得及离开的1名群众。随后几天，在国家主义分子的告密下，法国警察又逮捕了林蔚、宋锡钧、雷定琨、卢政纲、李畅英、任单宣等20多人。7月初，法国当局又宣布将金百铭等8名旅法中国革命青年驱逐出境。就这样，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

家主义派的合谋下，留法共产主义者开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遭到失败。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不断地调选干部或者到莫斯科学习，或者回国，直接参加主战场斗争。如前所述，1923年3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高风、王凌汉、郑超麟、陈九鼎、袁庆云、王圭、熊雄等12人前往莫斯科。11月，刘伯坚、尹宽等也去莫斯科。1924年赴莫斯科的又有聂荣臻、蔡畅、穆清、傅烈、饶来杰、陈家珍、彭树敏、李富春等20多人。1926年1月，在被法国当局驱逐前夕，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人经柏林，也到十月革命的故乡去学习。周恩来则因为在法国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法国警察当局的注意，于1924年7月奉调回国了。旅欧党团组织人数逐渐减少，主要任务也仅限于动员党团员“早日回去作战”。青年团旅欧地方团提出“努力研究，从早归国”的口号，还制定了训练的原则和方法，并规定了研究的步骤和材料，他们立场坚定，方向明确，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至此，轰轰烈烈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结束了。从早期的劳工神圣、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到后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救国救民之路几多艰辛，几多坎坷。辛亥革命以前的1905年，曾有近万名中国学生留学日本的记录。但赴法勤工俭学的意义与此不同。血雨腥风中，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终于成长为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邓小平……这些革命前辈的业绩将永远鼓舞着下一代，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也将作为中国革命史的组成部分，名垂史册，彪炳千秋！

